



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

# 一个家庭 两个世界

顾毓琇 著





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

# 一个家庭 两个世界

顾毓琇 著 张遇 杨波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家庭 两个世界: 顾毓琇自传 / 顾毓琇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8

(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

ISBN 978-7-5399-4141-7

I. ①一… II. ①顾… III. ①顾毓琇 (1902~2002)  
—自传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9880 号

- 书 名 一个家庭 两个世界: 顾毓琇自传  
著 者 顾毓琇  
责任编辑 蔡晓妮 伍恒山  
责任校对 丹 枫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11.25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141-7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序

《一个家庭 两个世界》，是我父亲顾毓琇（一樵）先生用英文写的自传，于1982年在美国出版，他时年80。这本英文著作于2000年11月曾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国内再版。同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张昌华先生在编辑我父亲《百龄自述》时，建议将《一个家庭 两个世界》译成中文，我征得父亲同意后，交张遇、杨波先生翻译，译稿由我分批寄到费城，请父亲亲自校订，他很快陆续寄回，于2000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辑是严国珍女士。中文版除翻译原著外，父亲又补写了从1982年10月至2000年11月的大事，并将新写的《纪念60位师友》等文作为附录，还增加了几张照片。这时他已是98岁高龄。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专家学者编辑的《顾毓琇全集》，共16卷，其中第11卷收入了此书（中文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底出版。

我于2000年底赴美探亲时，将刚出版的此书和全集带给父母，（同时邮寄了一批，）他们看后非常高兴，认为是父亲生日（12月24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久，20世纪过去，新世纪到来。

父亲于2002年逝世，享年100岁。我母亲王婉靖夫人于2006年逝世，享年105岁。他们生于20世纪之初，一同进入21世纪。一生传奇，丰富多彩。

《一个家庭 两个世界》中文版在上海出版发行后，不久



就已脱销。很多有识之士认为这不仅是一本自传,对了解和研究近代历史也具有可贵的参考价值。全书记述真实,文笔流畅,作者将亲身经历和家庭遭遇以时代变幻为大背景,由感而生的一些真知灼见,耐人寻味思考。

现在时隔十年之后,江苏文艺出版社将此书再版,相信广大读者能在不同方面引起兴趣,这也是对我父母很好的纪念。

谨代表作者亲属,对出版社和蔡晓妮编辑等有关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谢!

\* \* \*

我父亲于1902年诞生在江苏无锡市虹桥湾(今学前街三号)祖居,童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2年考进竣实学堂(今连元街小学),品学兼优,1915年未满13岁时考进清华学堂(后为清华大学),北上求学。

我的祖父顾虞明(晦农)公早年接受了当时的新思想,相信读书救国、科学救国,送长子毓琦(我的大伯父)到上海同济(后为同济大学)学医,送次子毓琬(我父亲)到北京清华(后为清华大学)学工,送三子毓琮(我三叔)到上海南洋公学(后为交通大学)。不幸在他35岁时英年早逝,留下六子一女。当时我大伯父才15岁,我父亲不满14岁,其他子女(我三叔毓琮、四叔毓珍、五叔毓瑞、姑母毓桐)都还幼小,最小的儿子(我小叔毓琛)半年后才出生,是遗腹子。遭此巨变,家道中落,孤儿寡母,度日艰难。我祖母王镜苏(诵芬)太夫人当年只有34岁,坚韧刚毅,深明大义,秉承夫志,坚持要子女继续求学。以后我父辈一门出了五个博士,我姑母也大学毕业,姑夫王兼士先生也是博士,在无锡传为美谈。我祖母含辛茹苦,教子成才,受到人们敬佩。少

年时家庭的不幸,使我父亲很早就体会到人间的许多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也使他志向高远,更加发奋上进,自强不息。

\* \* \*

他在清华由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苦读 8 年之后,于 1923 年公费到美国留学,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专攻电机工程。花了 4 年多时间,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当时为师生所称道。1928 年 2 月获得科学博士学位时,未满 26 岁,是该校电机系获此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

在求学期间,发明了“四次方程通解法”和“顾氏变数”等,以后又以许多科研成果、学术论文,奠定了他在国际电工界的权威地位。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他又研究自动控制特别是非线性系统控制,成为国际上公认的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

1972 年,荣获 IEEE(电机及电子工程师学会)最高奖兰姆金奖。2000 年他 98 岁时,又荣获 IEEE 千禧金奖和电路及系统学会的杰出成就金奖。此外还曾获得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金质奖章等多种奖项。

他注意理论与实践结合,早年曾先后在美国著名的西屋公司和通用公司担任工程师,20 世纪 50 年代后曾在几家大公司兼任顾问工程师。1929 年初到浙江大学任教时,曾兼任浙江电气局顾问和电气试验所主任。创办《电工》、《电世界》刊物,兼任编辑。

20 世纪 30 年代初,他与好友创办了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曾任会长。又担任中国工程师学会副会长多年。从 1946 年开始,当选国际理论及应用力学个人理事,连选连任达半个世纪。还



被选为美国科学院理论及应用力学委员会委员。又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 \* \*

1929年他学成回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教授生涯。先是在浙江大学担任电机科主任,后到中央大学任工学院院长。1932年应召回母校清华大学创办电机系,为首任系主任,后任工学院院长。同时创办了航空研究所和无线电研究所,都曾兼任所长。

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作为无党派人士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并兼任战时教育委员会主任,历时6年半。以后又担任中央大学校长。

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作为知识界的代表,以中国中将参议的身份参加了接受日本投降的受降典礼。后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国立政治大学校长。

在担任行政职务期间,他从未放弃专业,一直兼任大学教授,亲自为学生讲课。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时,江泽民同志曾是他的学生,他们的师生情谊,已成为历史佳话。

移居美国后,先是应聘回到母校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以后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终身教授。这所著名的“常青藤学府”至今还保留着他的办公室。

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曾多次回国讲学,担任了交通大学(包括上海、西安、北方、西南、新竹五所交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北工业大学、西北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江南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的名誉教授,并为中美文化教育交流做了许多工作。

\* \* \*

他一贯主张文理并重、理工并重。自己兼好文艺。早在清华读书时,就开始写作和发表了不少小说、剧本,参加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研究会。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创办了国立音乐学院(今中央音乐学院前身),曾兼首任院长。将古乐谱译成五线谱,又首先将席勒的《欢乐颂》(贝多芬作曲的第九交响乐第四乐章)从德文译成中文。1991年和2001年,北京先后举办过“顾毓琇作品音乐会”。他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曾自编、自导、自演话剧,创作的剧本富有爱国激情,多次公演。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冲破重重阻力,与朋友一起创办了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今上海戏剧学院前身)。他更喜爱诗词,所作诗词近八千首,曾获得“国际桂冠诗人”称号。

由于他在多方面的成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授予文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台湾成功大学授予博士学位。

他晚年仍笔耕不辍,常有新作,同时整理旧作。从1990年起,仅由我经手在国内出版的就有《顾毓琇戏剧选》(1990年2月)、《齐眉集》(1991年2月)、《顾毓琇科学论文集》(1992年2月)、《毫毫集》(1993年4月)、《水木清华》(1994年4月)、《蕉舍诗词》(1995年12月)、《顾毓琇诗歌集》(1996年11月)、《顾毓琇词曲集》(1997年2月)、《行云流水》(1998年8月)、《百龄自述》(2000年5月)、《一个家庭 两个世界》(2000年12月)、《期颐集》(2001年4月)等。他对许渊冲先生译成英文的《顾毓琇诗词选》曾亲自校订,2000年7月出版。

他喜欢旅行,曾遍游名山古寺,寻访高僧居士,晚年研究禅史,先后出版了《禅宗师承记》(1996年)、《日本禅宗师承记》(1997年)和用英文写的《禅史》(1997年)。《禅史》一书,已译成中文,于2009年出版。



\*

\*

\*

他一生遵循江东顾氏先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遗训，热爱祖国，关怀父老乡亲。早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又曾几次到灾区赈灾。1931年担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时，曾在南京率领师生欢送十九路军开往前线抗日。担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时，曾组织师生研制防毒面具，亲自送到前线。还曾负责秘密运送大批宝贵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到大后方。抗日战争期间从事战时教育事业，不遗余力，想方设法为国家培养人才。抗战胜利后，向往民主和平，关注经济建设，曾发表《中国的经济改造》、《中国的文艺复兴》等著作。1947年他的同学好友闻一多先生惨遭特务暗杀，他义无反顾地公开发表了《怀故友闻一多先生》，称闻一多“真是中华民族的忠实斗士”。

1949年后他侨居海外，但一直怀念祖国。从1973年起，先后八次回大陆访问和讲学。

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共十大刚闭幕的当晚，会见了我父母和我们兄妹，无拘束地畅谈了三个多小时。总理与我父亲在抗日战争时间早已相识，这次会见时说父亲当年参加国民政府是“客卿”，“圈外人当你是圈内人，圈内人当你是圈外人”。这次亲切的会见，给我父母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改变了起初不要公开的主意。当时十年动乱尚未结束，总理已经患病。

1983年，邓小平同志热情会见了我父母，父亲对科教兴国、藏富于民、实行股份制、改善中美关系等坦诚地提出了一些建议。小平同志将新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亲笔题签赠送。

20世纪80年代初，江泽民同志担任上海市市长和市委书记，我父母回国时几次与他重聚，共同愉快地回忆了40年代



在上海交大的情景。1989年泽民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父亲除表示祝贺外，恳切建议要更加顺应民意，重视民生，取信于民。特别是不能忘记“民以食为天”，要照顾农民，杜绝当时普遍存在的给卖粮农民“打白条”的现象。他的一些建议当即受到高度重视，也使他更加主动积极地建言献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时，我父母在国际上一片反华喧闹、首都还在实行戒严的情况下，毅然接受邀请回国参加了庆祝活动，并亲自考察了解国内的真实情况，客观地向外介绍。他多次讲要将狂风暴雨转变成和风细雨，要“去掉自卑感，树立自尊心，增强责任感，提高自信心”。

我父母还会见过王震、邓颖超、廖承志、李鹏、朱镕基、曾庆红、吴邦国、黄菊、钱正英、卢嘉锡等多位领导人。1991年、1992年已是90岁时，不顾年迈体弱，还再次回国，建议“文化开发、经济开放、政治开明”（文化包括科技）。

1997年江泽民主席和夫人访美，专程到费城我父母家中探望，已广为人知。2000年9月9日，父亲在我和三弟慰华、儿子宜凡和儿媳诸葛虹云陪同下从费城到纽约会见了泽民同志。受中央委托，刘延东同志曾到费城慰问叙谈。我国历任驻美国和驻联合国大使，也都曾多次往访。

父亲在祖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海外都有许多朋友和学生，人称“两岸桃李一手牵”，为祖国和平统一做了许多实际有效的工作。他宣扬“和平统一兴中华，天下为公进大同”，深入人心。在美国华人华侨中，他是德高望重的长者，晚年仍亲自参加中国使领馆和侨学界的许多情系祖国的活动。为增进中美关系，也作出了不少贡献。

人们称我父亲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文理大师，作为他的儿子，在长期的观察中，我感到他确实是博学多才。除了不可否认的天资聪颖，从小得到良好的教育之外，他的成就更在于勤奋努力。他坚持“今日事今日了”，非常珍惜时间。他说所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应该是“只怕用心人”，人都有心，贵在用心，就是要开动脑筋，认真思考。我们老家早年有“清楚真实”祖传匾额，遇事能弄清楚，求真实，就会有成果。

他晚年除了读书看报、写作之外，没有任何嗜好，又喜欢与人特别是青年人交谈，因此平时并不空闲。他思路清晰，动手敏捷，想起什么就提笔书写，有时真是废寝忘食。他年青时喜欢运动，能打网球，游泳，骑马，晚年不做什么锻炼，也不吃什么补品，认为多动脑筋，心平气和，清心寡欲，乐观开朗，淡泊名利，荣辱不惊，就能超凡脱俗，就是养生之道。

父亲交游广阔，可谓朋友遍天下。朋友不分籍贯职业，富贵贫寒，地位高低，年龄大小，都一视同仁，坦诚热情。他看人相当透彻，记性很好，能记得许多人的情况。他反对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但又是性情中人，年青时比较性急，对熟识的朋友会当面善意直率地提出批评建议，但力求叫人心服口服。他是非分明，抗战时期痛恨汉奸，生前反对台独，但对常人则是宽宏大量。

我父母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从来不求回报。我从许多日常小事中感到他们真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父亲对学生特别关心，为不少人介绍工作，设想前途。他喜欢请客，我母亲会做一手好菜，因此许多朋友特别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常常成为座上客，但他们自己吃得很少。晚年常去中国城请客，凡是从中国去的客人，都要在费城“醉仙楼”款待。

父亲一生实际是工薪阶层，晚年更是靠养老金生活，自己非



常节俭,有些西装、衬衫都由我母亲缝补过。但稍有积蓄,就要拿出来办奖学金或捐给慈善事业。他在国内外许多大学以亲友名义设立的奖学金已难以计数。

我父母认为子孙都应当自立,他们除了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外,没有留下什么遗产。

\* ————— \*

我祖父早逝,父亲对我祖母非常孝顺。早在美国留学时,就节衣缩食,省下一些公费 and 在外打工的收入,每月都要寄给我祖母贴补家用。祖母生前大部分时间都由我大伯父供养,我父母结婚后曾先后接祖母到杭州、北平侍奉。他对弟妹手足之情,非同一般,同他大哥一起培养弟妹认真细微,尽心尽力,在大家庭里享有很高的威望。

我的慈母是典型的中国的贤妻良母,与我父亲相依相伴了七十多年,伉俪情深。父亲常说没有母亲他不会活得这么长久。他的许多著作都写明是献给我母亲的,而且都由我母亲题写书名。母亲的画作也都由父亲题诗。

我父母养育了八个子女,都是由母亲自己喂奶。

二妹慰慧于抗日战争时间在重庆北碚因躲避日寇飞机轰炸不断钻防空洞而患肺炎夭逝(1939年10月——1941年2月),父母极其悲痛,父亲为此写了散文《慰慧》,读之令人感动。从此父亲开始写诗词。

————— \* ————— \*

我幼时父亲很忙,对子女管教甚少,慈母相夫教子,担当了抚养教导五子二女的重任。父母的言行举止和人格魅力,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他们对子女要求严格,主要看重待人接物、为



人处世。要我们用功读书,但不赞成“死读书”。对我们学校的成绩单都要一一过目,但不过分计较分数和名次。父母处于社会上层,但清廉自守,由于子女众多,家庭并不富裕,对子女更不娇生惯养。我和大哥慰连读初中时,父母就叫我们住校,在山沟里过抗战时期艰苦的集体生活。

父母对我们的兴趣爱好给予自由,从不横加干涉。父亲自己是电机工程博士,当然希望有子女能继承这个专业。我读中学时比较喜欢数理化,想长大后当个工程师,为此他感到高兴,而我的大哥却对工科不太有兴趣,父亲也不勉强。以后大哥学了农业(曾任沈阳农业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不幸于1990年逝世)。

受父亲的影响,我们兄弟(妹)从小养成了读书看报、关心时事的习惯。上海解放前我和大哥慰连、大妹慰文看了许多进步小说和书刊,当我们还是中学生时,出于爱国心和正义感,追求民主自由,都满腔热情地参加了学生运动,以后又先后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我们家还一度成为地下党的活动场所。

那时我大哥在中学入党后已进大学,才19岁。我读高中,不满17岁。大妹刚读高中,才15岁。地下党是单线联系,我们兄妹也互相保密(解放后才知道都已入党)。解放前我们都比较幼稚,有些行为难免不引起父母的注意,但他们相信自己的子女不会去做坏事,并没有严加阻止。父亲早年也参加过学生运动,从有些言谈中可以隐约地感到,他内心实际上对学生运动是同情的,反对镇压学生,还曾帮助过个别学生获救。

上海临近解放时,父母被迫离开大陆,带着我三弟慰华、四弟慰中、小妹慰民,经台湾、香港去了美国。我五弟慰国以后也

去了美国。我和大哥、大妹三个大孩子不肯跟随，从此父母与我们相隔了二十四年之久！

当时我祖母还健在，老人家和我三叔、四叔、姑母都在上海。我的外祖父在无锡，几个姨母也在上海。

于是形成了“一个家庭，两个世界”！

\* ——— \* ——— \*

解放前父母知道我们三个子女对国民党统治不满而思想“左倾”，但不知道也没有想到，才十几岁的孩子竟会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直到1973年父母带小妹回国，周恩来总理接见他们和我们兄妹时，总理风趣地对我母亲说：“感谢你为我们生了三个共产党员”，父母才知道我们早已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还正处于“文革”时期，总理还说我们“而且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和锻炼的共产党员”。父母从陪同人员处得知我们都曾饱受冲击，更因家庭关系而“罪加一等”，对我们加深了谅解和亲情。

以后我们书信来往不断，“文革”结束后父亲来信更多。父母八次回国，我都全程陪同，由此也对二老有了更深的了解，常恨忠孝不能两全！

1989年起我几次因公访美，顺便去探望双亲，但每次在家不过两三天。1993年后，我从工作岗位上退居“二线”，才有机会每年都赴美探亲。父母逐渐年迈体弱，我大哥、大妹先后去世，在美国的弟妹也不在父母身边，我想多陪伴侍奉他们，但由于我当时还没有离休，又担任了全国政协第八、第九届委员共十年，父亲认为我在国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应当“多为国家效力”，要我不必为他们而在美国多留，所以每次探亲只有二、三个



月。每次去时,父母都非常高兴,在美国的弟妹和小辈也都回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但每次离开时,又不免伤感。我初到美国时,人地生疏,父亲还亲自到费城机场迎接,朋友们莫不为之感动,当时他已是90多岁的老人!

二老晚年对孙辈的关爱令人难忘。他们叫我大哥的儿子宜群赴美留学,从大学读到研究生,一直住在家里。我女儿宜音和女婿李耀恩在美双双获得博士学位后,他们专程从费城到芝加哥亲自主持了婚礼。我儿子宜凡每次到费城,他们都慈祥地同他谈古论今,孜孜不倦,常至夜深。

我和家人曾几次动员父母回到祖国生活,我们感到对于这对老人,中国的生活条件比美国更要好些,国内领导也曾几次向他们表示回国定居可给予各方面的优厚待遇,但父亲认为自己“一世清名”,不能接受特殊照顾。同时,认为留居海外更能为祖国“略尽绵薄”。

\*      \*      \*

他们在美国费城居住了50年,2001年9月11日,我小妹和妹夫接他们到奥克拉荷马。那天纽约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恐怖事件,他们在途中才知道。

2001年12月24日,按中国人的习惯算法,是父亲百岁生日。他坚持谢绝了外界的一切祝寿活动,只允许我和弟妹、子女家人到奥克拉荷马团聚庆祝。

2002年8月,父亲病重。我赶到医院时他神志仍异常清楚,以微弱的声音询问国内的情况,还在关心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江泽民主席又将访美以及台海形势等大事,多次说对中国的事情包括和平统一大业要抱乐观态度。

9月上旬奥克拉荷马天气晴朗,9月9日早晨突然下了阵



雨,父亲平静地停止了呼吸。说来凑巧,那天正是我年满 70 岁的生日。人们安慰我说,年已古稀的人为老父送终,是他老人家一生积德修来的福气。

父亲逝世后,海内外发来了许多唁电表示哀悼。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等许多领导人给我母亲发来的电文,对我父亲评价非常中肯。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也给我写信致意。

遵照父亲“生前了俗事,身后少虚名”和丧事从简的遗嘱,我们家人举行了简朴的哀思会。本来不想惊动别人,但是国家领导人还是派总领事专程赶到送花圈和向遗体告别。

在美国,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杨振宁博士欣然担任了主任委员。费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当时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驻联合国大使王英凡都亲临致词,成功大学校长吴京等台湾朋友也参加悼念。我和亲属本来希望不必举办大型追悼会,在婉谢劝阻不成的情况下,我和儿子、儿媳也赶到费城,对各界人士深表谢意。一些美国朋友代表参加这个追悼会后,又举办了追思会。

2006 年 3 月 23 日,我的慈母也无疾而终。我们家人举办了简朴的追思会后,我同儿子宜凡将二位老人的骨灰迎回祖国。到北京时,有关部门负责人曾到机场迎接。

2006 年 4 月 3 日,在我们无锡故居举行二老的骨灰安葬仪式。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同志和江苏省、无锡市多位领导出席并致词,不少亲友参加,随后将二老骨灰安葬在太湖之滨九龙山上的湖景公墓,实现了他们“叶落归根”的遗愿。

父母逝世后,我代表亲属将无锡学前街三号故居捐给了无锡市人民政府,同时捐献了许多文物。经中央批准,成立了“顾毓琇纪念馆”,江泽民同志题写了馆名。

2010 年 4 月 27 日,江泽民同志和夫人王冶坪同志亲临纪

纪念馆参观。

\* ——— \* ——— \*

2002年,南京大学在校园内为他立了铜像。

江苏省文联、电影家协会和无锡市委宣传部联合拍摄了文献记录片《百年毓琇》。这部影片在我父亲患病时就已筹拍,可惜摄制组去美时父亲已经病故,但仍收集了许多资料,于2002年年底完成公映。

2002年12月,江南大学举办了“顾毓琇学术研讨会”。

2009年,香港凤凰电视台拍摄了记录片《我的中国心——江南有一樵》,介绍了我父亲的生平。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与美国电机及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合作,设立了“顾毓琇电机工程奖”。江泽民同志题了字。2010年10月25日在杭州举行了首次颁奖典礼。我和儿子有幸参加了盛典。

最近,复旦大学历史系在近代史研究中,对我父亲的一生也给予了重视。

\* ——— \* ——— \*

父亲以“清风、明月、劲松:学者、教授、诗人”来概括自己的一生。

他的百龄人生正处于一个不平常的时代。时代造就了个人,决定了家庭的命运。个人和家庭,也可能是时代的缩影。他的本书中说:“我们希望这两个世界能够保持友好状态。——让世界成为一个家庭吧。”

顾慰庆

2010年11月1日